

抗日战争研究

KANGRI ZHANZHENG YANJIU



4
1994

封面设计 马晓光

需购《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1992年、1993年各期者，请与本刊编辑部（地址见封二）联系，共10期25元，另加邮资5元。

抗日战争研究

1994年第4期

出 版 者 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印 刷 者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发行 邮发代号：82—47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代号 Q187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刊号 ISSN1002—9575
NO11—2890/K

国内定价3.50元

抗日战争研究(季刊)

1994 年第 4 期 总第 14 期

目录

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 刘大年(1)

中日甲午战争一百周年

前言…………… (6)

甲午战争研究·台北…………… 林庆元(7)

甲午战争的历史影响·北京…………… 董建中 黎烈军(14)

甲午海战与中国海防·北京…………… 张 炜 方 坤(19)

大连军民的抗日斗争·大连…………… 杨惠萍 郑学成 关 捷(24)

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威海…………… 玉 明 沫 兰(27)

南京大屠杀事件之再研究…………… [美]吴天威(39)

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南京的血腥暴行…………… 高兴祖(61)

对旅日爱国华侨杨启樵教授驳斥日本

“南京大屠杀”案否定派的介绍与补充…………… 谢雪桥(7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 段月萍(92)

桂系主皖和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童志强 周 蕙(102)

晋察冀边区 1939 年的救灾渡荒工作…………… 李金铮(120)

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内地难民问题…………… 张 丽(132)

纳尔逊及其使华述略……………张国镛 陈一容(142)

美国外交档案中关于纳尔逊使华的史料选译

……………吴景平 章红 何品译(159)

· 书评 ·

评马振铎《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马仲廉(184)

《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读后感……………郭德宏(193)

· 学术信息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战场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林超民(202)

华北地区保定军校暨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综述……………李金铮(209)

· 抗日战争纪念地纪念馆 ·

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简介……………赵惠兰(211)

· 抗战报刊介绍 ·

《抗战》三日刊介绍……………陈杏年(215)

· 简讯 ·

重庆筹建抗日战争陪都博物馆……………冯开文(227)

柳州市集会纪念阍维雍将军抗战殉国 50 周年……………王学山(228)

《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晨(229)

《世界史研究动态》改为《世界史研究年刊》……………世界史所(229)

《炎黄春秋》介绍……………(230)

《党史研究与教学》介绍……………(230)

本刊扩大征稿启事……………(231)

来函照登……………(232)

1993 年抗日战争史论文目录索引……………近代史所图书馆(233)

1991 年本刊目录索引……………(249)

本期英文目录……………(253)

图片……………(封三)

本期出版时间 1994 年 11 月 26 日

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与民族精神

刘大年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的问题。这个事情抓得很及时。会议通知中列举的一些题目，我讲不出多少意见，只能就其中的两个问题简单说几句。

一 关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

八年抗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这个根本转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从这方面看，那些低估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说法，是不正确、不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力量的兴起是基本条件之一。这个基本条件的作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就无从实现，蒋介石就只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路上走下去；或者全民族抗战一时实现了，中国能否取得胜利，那是一个大问号。从这方面看，那些低估这个基本条件的说法同样是不正确、不全面的。回顾一下近代历史，就会明白这

一点。

抗日战争中，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人民力量空前强大起来。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是紧密相连的。前一个演变关系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问题。谁在抗日战争中最出力，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更有发言权，去领导缔造新中国。反过来也是一样。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收复广大国土，得到人民拥护，力量大幅度上升；国民党由前期积极抗战，比较得人心，变为后期消极退守，保存实力，实行专制统治，日益丧失人心，政治影响衰落下去。抗战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只有三万多人，革命根据地只有一个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多达100万，民兵200万，抗日根据地北起长城内外，南至海南岛，人口多达一亿。以前共产党始终被国民党指为不合法，这以后才开始取得与前者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不久，中国并踏上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道路，归根到底就是由抗日战争这个历史的转折所造成的，是和那种政治力量对比的决定性改变分不开的。所以，要问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我以为用一句话可以回答，那就是，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加速了新中国走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出自历史的选择。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也阻挡不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没有阻挡得了，蒋介石和美国加起来也没有阻挡得了。新中国很快就要庆祝自己的45岁的生日。尽管经历过曲折，它至今取得的成就为举世所瞩目。这证明抗日战争所开辟出的道路是合理的，富有生命力的。纵观那段历史，人们将可以从本质上来认识现实，站在更高的位置上来分析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满怀信心去从事当前现代化事业的斗争。

用不着说,历史不等于现实,它也不可能这样那样为现实辩护。指出抗日战争开辟出了中国前进的大方向,丝毫也不意味着认为它就会像东西长安街那样可以笔直走下去。变化是事物的总规律,问题只在于如何变。

二 关于抗日战争所体现的中国民族精神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回答是:中华民族传统悠久、根基深厚的爱国主义,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族压迫的精神。这个回答完全对,大家也都熟悉。我们最好能够找出更形象、更具体的说法来表述那种精神。在这里,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前辈们在抗日战争展开以后是怎么认识,怎么讲的。1938年7月,武汉举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一周年。国民参政会最年长的参政员,年愈古稀的老翰林张一麐致词。他说,“七·七”是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更加光荣。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主持纪念大会的郭沫若把张一麐老人认为抗战是中国人的光荣,要永远竖起一条脊梁的话,作为民族典故写在自己的文章里。中国军民面对汹涌而来、猖狂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奋起抵抗,前仆后继,可歌可泣,这首先就是依靠他们敢于竖起自己的一条脊梁。无疑地,这正是抗日战争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有了这个伟大的精神,才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人空前觉醒,他们强烈要求复兴中国,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巨大的凝聚力;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绝大多数人敢于竖起自己的脊梁,积极行动,顽强斗争。谁都知道,并非无论什么中国人,一律竖起自己脊梁的。那些人中,有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纷纷出面充当日本傀儡的封建余孽;有国民党高层中叛国投敌的汪精卫一伙,以及国民党军几十名喊着“曲线救国”率部降日的将领。然而那些汉奸败类的出现,终究不过是伟大抗日洪流中一刹间就消散了的泡沫。抗日军民的光荣和竖起自己脊梁的民族精神却是永存的。前代的爱国者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也应该是现代人以及我们的后来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中国今天处在最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中每一样事情都是崭新的。竖起自己脊梁的民族精神是否意义减少了,需要重要评价了呢?我们的现实斗争的目标、环境条件与50年前根本不同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能认为抗日战争所表现的那种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可以丢掉,可以轻视了。今天不是改变对它的评价的问题,而是如何加以发展弘扬使它具有更广阔、更新含义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并在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其中有向前进的方面变的,也有向后退的方面变的。例如,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美国在全球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在中美关系上,它把所谓遏制中国作为自己的任务,到处插手。美国某些言论媒体经常制造反华舆论。就在今年7—8月号的《未来学家》上刊有一篇叫做《世界领导权》的文章,鼓吹创立“大国协作组织”,由美国充当领导,把中国排除在大国组织外面。在那家杂志主持者的眼睛里,中国在亚洲、在世界似乎并不是有合法权利的国家;中国居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它的武装力量和经济成果,都是不算数的。又例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力量增强,广大群众、广大知识分子不会容忍战前军国主义的统治再现。和平发展是日本的主流。然而,日本政界一些人给日本侵略中国翻案的喧嚣,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嚣张。他们不满足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要求重新成为军事大国。他们以前的翻案还只是在历史教科书上把“侵略”改为“进入”之类,现在则扬言日本侵略中国、侵略亚洲邻国不但无罪,而是有功,而且是有大功。这个大功,一是把亚洲国家从英美统治下“解放出来”;二是亚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发展,应该“归功于战争”,即归功于日本的侵略、统治。对此我想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加以评判。前些天,《朝日新闻》的一篇社论上说,从1986年以来,日本政府因“战争责任发言”而更换阁僚,到现最近撤换环境厅长官樱井,已经是第四次了,不知今后还要重复多少次。那么狂言者屡次因所谓“战争责任发言”,而不得被迫下台,这说明什

么？这说明今天的中国和亚洲确实是一个新中国、新亚洲了。它们岿然屹立在那里，谁要任意颠倒历史再也难以办到了。问题在于，日本政界某些人所以要屡次跳出来重复那些谎言，是他们的话有听众，有人督促他们讲。他们讲了，能够在那些人中博得喝彩，抬高身价，以至猎得权位。这就是说，他们的话是反映了潜在的军国主义势力的动向，反映了日本社会中总有那么一股势力，那么一批人，盼望有朝一日重温“皇军赫赫战果”的旧梦。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可对此置之不理。

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与世界广泛交往，要办外交，要做生意，要让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要进行思想、文化、学术交流，要认识、了解世界多种多样的事物，并对那些事物有所评价。这不是少数人的事，是大家的事，至少是很多人的事。但不论进行哪种交往、交流、评价，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不可缺少民族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显然应该就是抗日战争所体现的、并因此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竖起一条脊梁的精神。这就是在面对霸权主义威胁干涉，有可能丧失民族尊严、国家权益的时候；在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潜在势力的挑战，须当回应的时候；在外来势力的政治蛊惑、物质引诱下，可能自辱于炎黄子孙的时候，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发生人格国格问题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时候，我们需要坚持一条：竖起自己的脊梁，保持民族光荣。抗日战争所体现的这种民族精神是不会过时的——至少在可以想像的未来是这样。

（1994年8月24日于北京房山十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日甲午战争一百周年

前 言

甲午战争是近代日本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当时中国处于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统治下，迅即被国力强弱相差无几的日本打败，最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中国遭受了一次奇耻大辱。

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中日关系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重的。甲午战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甲午战败后的《马关条约》和八国联军之役后的《辛丑条约》，都勒逼中国偿付巨额赔款。这是其后中国财政枯竭人民贫困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严重迟滞了国家工业化的步伐。另一方面，甲午战争的国耻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从而加速了中国改革（维新）和民主革命的进程。而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因得到巨额赔款，进一步扩充军事实力，并且，从此滋长了侮慢中国的思想，肆行侵华扩张，威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生存。本世纪30年代起，日本不断向中国施行武力进攻，最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历史如同一根链条，一环扣着一环，前后各链环间都是互相紧密关联的。从日本侵华的角度看，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是甲午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现，不过规模更大，时间更长，手段更野蛮残酷，对中华民族的摧残危害更加深重了。但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与19世纪末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不同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坚韧不拔，历尽艰难，持久抵抗，终于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取得了对日抗战的成功。中国不仅赶走了日本侵

略者、收复了失土，而且击溃了半世纪前的国耻，收复了《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的领土台湾，中国抗日战争与甲午战争在历史脉络上是前后相通的。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全国各地（海峡两岸）先后举办学术讨论会，对甲午战争及其历史影响进行研讨。现将各地学术讨论会的综述发表于后（按时间先后为序），供抗日战争史和近现代史学者参考。

——编者

甲午战争研究·台北

林庆元

1994年6月25—27日，由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主办的“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我国台湾、大陆，和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学者一百余人。会议共收到论文32篇。这次研讨会共分四个主题进行研讨：（1）外交与国际情势，（2）海战与陆战，（3）马关条约与割台，（4）战争的结果与影响。

大会首先请台湾学者李国祁教授作“甲午战争的时代意义”的专题报告。李教授指出：甲午战争对亚洲来说“象征着一个属于日本的新时代来临，以中国为主体的传统时代业已结束”。他还具体阐明了此次战争对中国台湾和朝鲜的影响，认为日本从此对台湾展开长达50年之久的高压和缺乏人性的殖民地统治，其特点是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一切关系，遏止台湾经济的充分发展，视台湾同胞为劣等民族，实行警察统治。但他也认为，日本在台推行了在

日本本国尚未推行或只部分推行的近代化措施。

一、甲午战争与国际关系

关于甲午战争与国际关系的讨论,是这次会议的热点。提供有关论文的有《甲午战争与近代国际关系》(林明德研究员)、《约翰·福斯特与甲午战争前后之中美关系》(徐乃力教授)、《中日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戚其章研究员)、《甲午前夕日本对中华宗藩体制的挑战》(张启雄研究员)、《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王良行副教授)、《中日甲午开战与俄国外交政策》(全寅永教授)、《东学农民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金钟润教授)、《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动态》等。戚其章研究员深入地分析了俄英对中日关系政策制定和变化的过程,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远东国际情势,日本“抓住了英俄对峙这一关键,而分别采取不同策略,一手稳住俄国,一手对英国打‘俄国牌’,将英国拉到自己一边”。

二、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性质

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和性质,也是大会讨论的一个焦点。日本学者中塚明早就通过对《清国征讨策案》的研究,指出日本侵华战争蓄谋已久。此次会上,他做了有关的报告。林明德研究员认为,这个方案,准备在1892年以前完成一切战备工作,趁在中国军制改革以及欧美各国增强远东实力之前发动攻击,并提出具体步骤,即在战胜之后,占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台、澎以及长江流域等广大区域。论者认为:“此一方案的调查,判断和定计,可说钜细靡遗,筹划周详,证之后来的马关条约、民初以后的满蒙分离政策等,与此方案颇多吻合,足证日本大陆政策的目标与计划,早在甲午战争前数年,即已在日本政府与军部的运筹策划之中。”王尔敏教授在《甲戌日军侵台清廷之援防因应》一文中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前20年就对中国台湾抱有野心。而藤井志津枝副教授则进一步指出,1874年日本侵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型”。水野明教授的《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则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思想的形成做了研究,认为:“日本之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可溯源于16

世纪末的丰臣秀吉之侵韩征明的战争。到了德川时代,这种雄飞大陆外扩膨胀的思想,更普遍地影响了一般民众。”他指出:“幕府时代中期以后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主张侵并中国的。”在考察日本战争意识之后,他又对明治政权体制加以详述,认为其政权是被掌握在萨长藩阀手里,甲午战争即来自明治的国家体制。

张启雄的文章具体介绍了《清国征讨策案》。该文件分为“旨趣书”和“攻击策案”。前者明白宣示侵华为日本“断然不动之国是”。“攻击策案”又分为三篇,即“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处置”,分为日本直属版图和满洲等五国。这个方案包括了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张教授的论文提出了甲午战争是日本与中国“争夺‘中华世界帝国’的领导权”。所谓“中华世界帝国”,他认为:“华+夷=中华世界帝国”的人民概念,王畿+属藩=“中华世界帝国”的领域概念,中国+诸王国=皇帝+国王=“主属概念”。不少学者对此概念和提法表示异议。

林明德认为,甲午战争“乃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取得“英美的支持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水野明教授也指出:“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扩张势力吞并朝鲜为目的的侵略战争。”郑樑生教授在《甲午战争前夕的中日两国动态》一文中详细地考察了日本入侵朝鲜的经过,指出:“中日甲午战争之爆发,并非偶发事件。日本之蓄谋挑起对华侵略战争,由来已久。”对中国而言,“这次战争完全是反侵略的自卫战争,其性质是正义的”。

三、甲午战争中的海战与陆战

甲午战争中的陆战与海战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热点。提交大会的论文有:《中日甲午战争陆战形态之比较研究》(傅应川教授)、《甲午战争之战争指导》(方一鸣教授)、《李鸿章的海军知识及海权思想》(王家俭教授)、《北洋舰队与甲午海战》(王英男教授)及《甲午黄海战役的结局及其在近代海战史上的意义》(林庆元教授)。这些学者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深入探讨甲午海战、陆战中

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傅应川教授在仔细地审视了陆战的几个战役之后,指出:日本接受了西方拿破仑战争理论,强调“歼灭”、“机动”、“集中”的原则,而且以决战为战斗的“本旨”,相反,清政府则以“守城观念”为指导,加上其他原因,因而一败再败。方一鸣《甲午战争之战争指导》一文则以欧美兵学理论为纬,十分全面具体地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认为“日本取胜在于日本以总体国力投入战争”。林庆元的论文也从海军战术和火炮演进的角度考察双方优劣,指出清朝在海战战术与火炮方面的陈旧是其失败的原因。吴志鏗先生的《甲午战争中吴大澂与所部湘军的表现》一文,是专门研究湘军在甲午战争中运作的论文。论者通过对吴大澂所部湘军的筹组、饷源、指挥、调度等考察,发现湘军在甲午战争中已“绿营化”或“经制化”,因而丧失了勇营的优点,都因清政府将勇营运作之权收回,又产生了绿营之弊。湘军的失利,并非只是吴个人“好大喜功”或湘军习气已深等表面上的问题,而是“更有一层历史发展的意义深具其中”。这见解颇有见地。笔者也认为,湘军体制已不能适应近代战争,何况倒退到绿营的体制,则更不待言。正因为如此,才有甲午战争中酝酿的清朝兵制的改革,从而使清朝兵制的变革向近代化发展。

以前,学者大多集中于海战的研究。此次会议,对陆战战略的研究,给了较多的注意,并有所推进。在海战研究方面,不但比以往较为深入详细,而且多侧重于海战的战略战术,特别从海军技术发展史角度来考察中日海战的胜负,是几篇论文的特色。

四、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的失败,与李鸿章关系甚大。探讨甲午战争,不少学者都论及李鸿章。王家俭教授的《李鸿章的海军知识与海权思想》一文,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李鸿章对建设海军所做出的贡献,肯定了李鸿章的海军知识,同时指出,李鸿章长期让非海军出身的丁汝昌任职和长期依赖洋将,使海军出身的本国将才受到压抑,“这两项错误,都与其后的甲午战败,具有相当的关系”。林庆元也指出:

“李鸿章对世界海军装备的新发展认识是清醒的，但他夸大了敌人的力量”，从而推导出“保船制敌”的错误战略，“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制海权轻易落入日本手里”。李国祁教授的《清末中国人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日本的想法》一文，认为“台湾的割让是形势使然，其割让与否的主动权根本不操在中国手中”。“清廷的应允割台也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绝非是清廷不重视台湾，故弃之于日本”。他还把李鸿章放在当时派系之争中加以评述，提出：“无论是和或战均不能得到朝中的全力支持，故党争或派系意识是为害及中国当时的对日交涉与备战的”，“由此可看出翁（同和）李的不和是如何影响此次战争”。这见解是有见地的。李鸿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加以深入研究，既不必为其在战争中的责任辩护，也不应该斥之为“台奸”，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五、马关条约与“割台”

探讨马关条约和“割台”的有5篇论文，即《战争终结条件和讲和外交》（桧山幸夫教授）、《中日和议与三国干涉》（林子侯教授）、《台湾割让的外援交涉》（叶振辉教授）、《刘永福与乙未反割台运动》（黄秀政教授）、《民友社与台湾》（吴文星教授）、《乙未台湾史事探析》（吴密察教授）。显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自始至终，都是在欧洲列强的影子笼罩下进行的。林子侯教授认为：还辽事件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中国沦为“次殖民地的国家”，但又指出，如果没有列强在远东之矛盾，被日本利用，日本仍然是一个“二流国家，不能称霸亚洲”。不少论文对列强矛盾产生的恶劣影响都做了充分估计。吴密察教授的论文认为：“抗日保台战争并无太多的正面冲突战争”，“规模也不是很大”，“黑旗军也未积极北上中部抗日”。许多学者不同意这类论点。黄秀政的论文对刘永福增援台湾抗日做了高度的评价，论者指出：“台湾民主国只是一个外交上的设计，其主要目的即在商结外援，借第三国的干涉，以压迫日本放弃台湾。”不久，唐景崧内渡，该组织即由刘永福担任“大总统”，所有成员均为

清朝官吏或生员。他领导的黑旗军矢力抗日,英勇牺牲,是台湾抗日的主体。

加拿大学者徐乃力教授利用国外资料,对福斯特在“马关和谈”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具体的评述。

六、甲午战争前后中日两国的社会政治团体与舆论

这次会上有些学者对甲午战争前后中日两国的社会政治团体及舆论进行了具体研究,如庄吉发教授的《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翰詹科道的反应》一文,对他们建议“围魏救赵”和主张持久战、长期抗战的主张所反映的爱国热忱加以肯定。“他们的用兵策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日本侵略思想的形成和活动,此次会上提交的《民友社与台湾》一文,专门对民友社的扩张主义进行剖解。该社出版和发表了占领台湾的言论。作者指出,民友社“扮演‘台湾占领论’的急先锋”,对日本经营台湾具有莫大的影响力。这是一篇专门研究日本知识分子在侵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文章,从中可窥见日本扩张主义意识的狂热程度。另一篇是藤井志津枝的《中日甲午战争与日本的大陆浪人》一文,对日本的“大陆浪人”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细致的评论,并追溯其形成的历史根源,指出“浪人”“大亚洲主义”所具有的侵略性,是“承继岛津齐彬思想,表现于出身萨摩的明治维新领导群中”。此外,作者还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浪人的活动。

七、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确实深远,因而,海峡两岸学者均把研究视线集中于此。从《中日甲午战后列强对中国铁路矿务利权的攫夺》(李恩涵教授)、《保甲制度撤废论争》(蔡慧玉教授)、《甲午战争对山东的影响》(张飞法教授)、《甲午战争与中国货币金融改革潮》(卓遵宏教授)、《清末国人对甲午战争及日本的想法》(李国祁教授)、《日本侵略思想的检证》(水野明教授),到《评论学者对甲午战争之看法》(陈鹏仁教授),研究的层次大为拓宽。李恩涵教授提交的是甲午战后列强攫取中国路权的专论,作者认为有四大特点:一

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而领事裁判权为其重要依据,二是与列强争夺努力范围相一致,三是以中外办矿合同为唯一依据,不遵守清政府有关的办矿法规,四是办矿名义中外合办,得利者实是洋商。因而作者结论是“对中国主权、行政权及自办矿权的正常发展,都发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作用”。《保甲制度撤废论争》一文,利用口述历史,否定了日本官方关于实行废撤台湾保甲制度的说法,作者还对“箝制台人自由达四十年之久的保甲制度”的功能变化进行了详尽考察。不少文章论及甲午战争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张玉法教授在论述对曾为战场的山东的影响时指出:“甲午战争对山东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洋务的停顿、财政的匮乏、治安的恶化、河工的废弛、商务的萧条等等。刘德美教授还选取了马关条约定为商埠的杭州进行考察。作者除对杭州日租界进行详细评述外,还着重研究了杭州人在甲午战争和日人开埠后的刺激下,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和兴办教育和实业的活动。

卓遵宏教授从金融改革的侧面,论述了甲午战争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作者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当时货币改革的酝酿过程,指出:这种改革“发动虽早,成长过程都如早产儿艰辛而漫长”,“中国货币金融的现代化究属拔苗助长或是良性激励”,“对当时和以后中国之影响如何”,“难以一定论”,“可能利弊得失只是程度上的差异”。

甲午战争对中国人有什么心理影响?李国祁教授精辟的分析了当时从仇日到仿日的心理转变,他认为20世纪初,“中日不仅不再视日本为雠仇,而且蓄意模仿之”。他还指出,其原因是“国家危险情势的逼迫,在急于求效见功的心理状态下,以为师法日本较为省时省力,可得急救”,“缺少一种彻底求新的精神”。

这次研讨会开得成功、圆满。学者们本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互相尊重,平等探讨的原则心情舒畅地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在这次讨论中,海峡两岸对中日甲午战争有许多相同的见解。绝大多数学者都指出,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